

## 感悟信仰的力量

——再读《可爱的中国》有感

□张波

88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江西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的牢房里,在他生命的最后7个月里,用勇毅而坚韧的力量写出了10万余字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本《可爱的中国》。

这是一部洋溢着令人无法抗拒的美好憧憬和希冀的散文名篇。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聆听过、阅读过、朗诵过它。我初读《可爱的中国》时,被它优美的文字、激昂变奏的语言和热烈的爱国情感所吸引;再读时,我节选了一部分,参加单位组织的阅读分享会,深深地沉浸于它流露出来的充满正义的论战和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之中。

重读《可爱的中国》,体悟到的是作者崇尚真理、浩然正气的个人魅力,以及身处绝境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革命豪情。环看新时代的中国,正如烈士笔下所愿:“朋友我相告,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至此,我深刻感到,信仰是一种力量,可以让我们掌握历史主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潮流之中。

重读《可爱的中国》,感受到的是信仰的温度。“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这段文字叙述了1935年5月2日作者开始提笔写作时的基本境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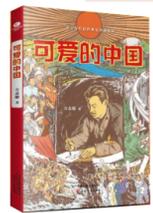
他清楚自己面临的人生处境,也明白留给自己的生命时光不多了。虽然身处绝境之中,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奉献最后一把力气。正如方志敏在书中所言,“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热烈。”这样的话语如此热诚,传递着信仰的温度,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一位革命者宽广的胸襟和理想的情怀。他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支撑着他在面对生命的绝境时,没有陷入绝望与哀怨中,而是心怀对祖国无比深沉的爱,展现出无畏艰险、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换取

国家新生的革命者气概。

重读《可爱的中国》,感受到的是信仰的力量。我第一次阅读完这本书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萦绕在心头:到底是怎样的情怀和力量,才能让一个人在身处绝境时还能义无反顾地为国家奋斗?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那就是信仰的力量。方志敏形象地将中国比喻成“生育我们的母亲”,用极其温柔而细腻的文字描绘着母亲的美好:气候适宜,如同母亲的体温;大山大河,如同母亲的健美的体态;物产丰富,生产旺盛,如同母亲无穷的乳汁与潜力;景色独秀,文化多样,如同母亲的美丽绰约。接着,笔锋一转,他用言辞激烈的文字控诉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蹂

躏,大声疾呼:“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方志敏始终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经过80多年手胼足底的奋斗,今天,我们把革命先烈的信仰落地生根在中华大地上,传承着、弘扬着先辈的梦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今天,我们可以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先辈们说:今日中国,山河锦绣,一切如你所愿!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信仰,相信相信的力量,正如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所言: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缩,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地奋斗!



## 国民参政会研究的新进展

——评《积极表达与消极回应: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1938-1945)》



□周勇

近日,王凤青教授的《积极表达与消极回应: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1938-1945)》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重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40年来,重庆学界便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王凤青教授的新著是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部著作紧紧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题,立足于国共关系这个主线,从军事国防、外交、内政、财经、文教等方面系统梳理了抗战期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大会中,与抗战建国问题密切相关、比较有价值且讨论相对集中的提案内容,考察了国民政府对提案建议主张的采纳实施情形、实际效果及由此引起的对国民党政权的深远影响,是近年来国民参政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成果。

首先,该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梳理了提案的主要内容。著作指出,在抗战期间召开的十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提出的1803件提案,内容涉及军事国防、外交、内政、财经、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其中,军事国防提案大体围绕提高军队战斗力、利用沦陷区武装力量、加强国防建设等内容展开;外交提案分为改善外交工作和加强侨务工作两个方面;内政提案主要包括维护团结和统一、推动国民政府政治进步、关注地方自治和动员救助民众四个方面;财经提案主要关注三大问题,分别是调整财经政策、稳

定战时经济、推动经济建设;文教提案基本上关注战时教育发展、复兴民族文化和边疆文教工作。这些提案内容既有对与抗战建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宏观思考,亦有对抗战中出现的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既有对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的系统、持续呼吁,也有希望国民政府未雨绸缪、注意某些领域和某些问题的善意提醒。

其次,考察了国民政府对提案的回应及效果。该著作指出,从纵向上来看,在1941年之前,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回应比较积极,一些建议主张被采纳后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的回应则比较消极,能够发挥作用的提案数量不多。从横向上来看,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回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对提案建议基本上进行了采纳,体现在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中,这类提案数量不多,所占比例很小;第二,对提案主张进行选择性的回应,采纳了部分建议;第三,对提案建议虽没有采纳,但由于提案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国民政府也开始关注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对提案建议虽有重视,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存在的“痼疾”、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及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议未被采纳,即使被采纳,提案本应发挥的作用也未能显现,这些提案在数量上占很大比重;第五,对提案关注的问题没有回应,特别是那些要求政治民主化及主张党派地位合法的提案,国民政府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基本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方式。

这也导致提案发挥的作用也呈现出多样性。引起国民政府重视、体现在其施政方针中的提案,推动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被国民政府部分采纳的提案,也推动了抗战的顺利进行;有些提案进入国民政府的视野之后,它开始重视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采取的措施不是提案的建议主张,但对抗战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未进入国民政府视野的提案,未能发挥

应有的作用;有的提案提出后,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成为国民党压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借口。

最后,剖析了提案实施效果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该著作指出,从某种程度上看,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提案回应的“有与无”“多与少”和“质与量”,直接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优与劣”“好与坏”和“成与败”。当提案主张建议得以落实,并在实践中产生良好效果时,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度就高,国民党政权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就强;反之,国民参政员就会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不满、疏离、不合作乃至公开对抗的态度,国民党政权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就会减弱,执政资源就会流失。该著作还指出,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为了动员全民力量进行抗战,国民党积极采纳国民参政会提案中的主张建议,认真回应不同政治力量对抗战建国重要问题的关切,对于推动抗战的顺利进行,维护国民党政权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民族危机压力的暂时缓解,国民党一党执政,压制其他党派发展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对国民参政会提案的采纳实施上,也变得逐渐消极,导致一些政治力量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不满与疏离。在此情形下,国民党本应通过积极采纳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建议主张,充分发挥其在汇聚民智、彰显民意、体现民情、凝聚共识方面的独特性作用。然而,国民党未能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对大部分国民参政会提案依旧采取了敷衍塞责的回应方式,从而导致国民党通过国民参政会构建其执政所需的意识形态,增强其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也成为国民党失去主导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也可为深入认识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实施效果与国民党政权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重要参照。

## 值得不断重读的汪曾祺

——从《受戒:汪曾祺小说精选》说开去



□蒋登科

我不写小说,也不主要研究小说。但这并不影响我读小说,也不会影响我喜欢优秀小说作品。

我喜欢汪曾祺,就像我喜欢他的老师沈从文。我说的他们的作品,优秀作品是作家人格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多年前,我总感觉对沈从文读得不够全面,就专门买了一套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抽了一段时间读完了,还根据阅读他的文艺评论、随笔、“废邮”系列文章所做的笔记,撰写了一篇谈论沈从文诗歌观念的文章。不过,因为专业和精力的原因,我现在还没有系统地读完汪曾祺的作品,但这不影响我对他作品的喜爱。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小说受到的关注很多。这些关注来源于学术界,更来自广大读者。这一点,从他的各种文集不断重印,各种选本不断出现,就可以知道。《受戒:汪曾祺小说精选》是汪曾祺多种小说选本中的一种,只收录了30多篇作品,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是汪曾祺所有优秀小说的汇编,但其中的作品确实都很精彩,能够较好地代表作家的艺术水准。

在判断离世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标准,就是看人们在作家去世之后对其作品的关注度。有些作家在世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很多关注,而真正优秀的作家往往会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不断被人提起,他们的作品也可以超越时空,超越艺术发展的潮流,会不断被人重新编选、出版、阅读、研

究。汪曾祺在世的时候出版过很多作品集,涉及到散文、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多个领域。这本《受戒:汪曾祺小说精选》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后人编选出版的。这种编选出版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不断挑选、淘汰的过程,编选者一定会尽量选择那些艺术精良、特色鲜明、个性突出、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品。

汪曾祺说:“我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这种追求是他的小说形成自身特色的根源之所在。作者肯定要根据自己的对历史、现实、人生、人性的理解把作品写好,但不能什么都说尽了,尤其是在涉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些核心问题的时候,优秀作家往往不会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读者,更不会说教,而是留下余地、空白,甚至留下问题,让读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去补充、完善,使作品的文本得到更大的延伸,最终形成完整乃至完美的“作品”。

汪曾祺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平和而奇崛、含蓄有韵味。作品所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没有多少高大的东西,也没有多么深刻的道理,但又让人感觉真实,好像写的就是邻家故事,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甚至是我们可以参与其中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鲜活的,但好像又都是我们熟悉的,或者是我们所期待的,比如他们对人情世故的思考、对命运的把控、对人性的思索、对技艺的坚守等等,都会和读者关注、期待的内容实现某种程度的重合。汪曾祺特别会讲故事,娓娓道来,不着痕迹,但他又在平和的叙述中嵌入出乎意料的情节,让我们的思绪、情感随着故事的进展、人物性格的展开,也在平和、惊喜、沉思等情感状态之间不断变化、转换。《受戒》《大津记事》《鸡鸣人家》《异秉》等等所涉及的人物、故事以及人物的命运,在不算太长的篇幅中精彩地呈现出来,既在情理之中,又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和我们的阅历、思绪、呼吸、心跳形成具有节奏感的互动。

汪曾祺小说的语调有时候似乎

不太像我们熟悉的小说写法,倒更像是散文的笔法,甚至化用了绘画的技巧。他自己就说过“我把作画的画法融进了小说”。汪曾祺的兴趣爱好很广泛,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用心,都有心得,甚至概括出了“做菜要有想象力”这样的精彩感受。他爱好书画,关注医道,喜欢做菜,对戏剧、民间文学也有研究。这些兴趣以及相关知识,都被他有意无意地用到了小说创作中,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活的趣味。作品涉及很多我们陌生或者熟悉的场景、风俗、物产,涉及到人情世故和日常的锅碗瓢盆,形成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风俗画,可以使我们对人物的成长、性格、命运获得更全面的了解,也获得对文化、生活、社会、人生的更全面的认知。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他的小说借鉴了一些诗歌的表达方式,余味无穷。这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很多小说的情节设计具有跳跃性,或者善于设置伏笔,或者插入一些看似无关实则相关的描述,或者在结尾处留下悬念;另一方面是作品的细节呈现以及人物语言、细节刻画等,都经过了精心剪裁,需要我们用心领会,才能将它们有效地串联起来,让人于会心一笑之间又若有所思,或者若有所思。还有一点,就是作品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金句迭出,警句不断,而这些不是强加进去的,既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格,也与情节的演进密切相关。它们是作家对人生的思考、感悟和判断。

当下流行一个词叫“治愈”,说的其实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在心灵、情感等方面受到的压抑、挫折,得到一定程度的抚慰、纾解、释放。这正是文学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之一。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的作品在缓慢的节奏中,呈现世界的丰富,人性的多元,带给我们的心灵和人生以抚慰、思考、启迪,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这样的作品都是所获的,值得我们细读和重读。

## 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

□孔庆茵

任何一本有关哲学的教科书首先都离不开对哲学是什么的追问。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有人认为是它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思维活动,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有人认为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有人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有人认为是充满理想的希望;有人认为是“自明性”的追问……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统一论调,但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选择困惑的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重要。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现代学术方法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开山之作,其地磅引玉之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都不能绕开这本书的影响,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作者首先从哲学的定义出发,提出了研究古代哲学的方法论。提出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评判,哲学史料审定的之法有史事、文字、文体和思想,整理史料之法有校勘、训诂和贯通等。开篇的序言和导言,作者提出评判古代哲学的标准并阐述了“述学”的重要性。“述学”是哲学史研究之前必须做的根本功夫。这些方法对如何从事

古代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入门之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路。作者对如何辨明史料的真伪等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其次,作者阐述了中国哲学史发生的时代。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前因后果。前因有二:一是那时政治社会的状态,即时势;二是那时思想潮流,即思潮。研究哲学史,须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思潮产生的种种思潮。任何一种哲学的产生都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这即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最后,作者从宇宙论、人生论、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中最有名的儒墨道等几家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墨”

与“别墨”,花了很大篇幅进行阐述,阐释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关系、人性论等问题,阐释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流变。

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史萌芽于西周,成型于春秋时期,终结于秦汉时期。本书分为十二篇,一半篇幅都在做考证,可以说是一半哲学,一半考据的书。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可能每一件都确凿之凿凿,这就需要我们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开思路的方法,尤其是研究古代哲学的方法。我们穷其一生,都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活着的意义何在等哲学命题。哲学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石,读一些有关

哲学的书对提升当代青年的思辨能力、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尤其是把握人生的航向等都有裨益。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